海上蛟龙
——蒙巴顿

海军世家——盛大婚礼——最年轻的上校——诺曼底计划的奠基人——挥戈东南亚——最后的辉煌

路易斯·蒙巴顿，英国当代政治家和军事家，英国前国防部参谋长、参谋长委员会主席，海军元帅，英国最后一任驻印度总督。

1900年6月25日，蒙巴顿出生于英格兰的温莎一个英国王族的家庭里。全名为路易斯·弗朗西斯·艾伯特·维克多·尼古拉斯·巴登堡，一战中他将有德国特征的“巴登堡”的姓氏改为“蒙巴顿”。其父原籍德国，后归属英国皇家为臣，曾任英国皇家海军部四位最高海军将领之一。其母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外孙女。蒙巴顿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他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蒙巴顿有着幸福的童年，作为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他每年都要随父母外出旅行，回德国的老家，也经常去俄国。他童年的记忆是由一幅幅印象派的画面组成的：在直布罗陀，他溜到楼下观看沃尔温上尉吃早餐，上尉咀嚼熏肉时，两个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朵就跟着扇动起来；在海利根堡，他躺在姐姐爱丽丝能俯视马场的卧室里观看马戏团的表演；在莫斯科，他的卧房俯瞰着克里姆林宫广场……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13年，年仅13岁的蒙巴顿像其他海军军官子弟一样，进入奥斯本的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他的父亲当时已升任第一海务大臣，而他又来自皇室，在学员中很惹人注目。1915年2月，他进入达特默恩皇家海军学院，在这里，他受到了高级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1916年7月，他作为一个见习军官到骁勇善战的海军上将贝蒂的旗舰“狮子”号巡洋舰上，作为舰长的侍从官，他得以有机会接近他心中崇拜的英雄贝蒂。三年的海上生活锻炼了他独立指挥的能力。1919年，他被送到剑桥大学继续深造，以弥补因战争而缺掉的课程。在大学里，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做一个辩论家，在一次有关削减军备经费的讨论会上，他的发言使他声名大振。另外，他对异性的鉴赏力也越来越高明，奥德丽·詹姆斯是当时刚出名的最漂亮的女演员。为了结识她，蒙巴顿想法弄到了一张奥德丽参加的舞会的门票，和她共舞一整个晚上。舞会结束后，他急忙赶回剑桥连夜赶写论文，第二天接着上课，晚饭前又赶回伦敦，和奥德丽参加另一个舞会。疯狂的热情驱使他一连84小时没睡觉。

1921年至1922年，蒙巴顿作为威尔士王子的副官，随同王子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日本等国访问。这是一次迷人的经历，他沉湎于皇家生活的奢华和异国情调之中。在日本，他被当成一个无足轻重的皇家随员而不是一名海军军官，得以侥幸参观了日本最新的战列舰“陆奥”号。旅行结束时，他总结说：“这次参观使我对日本资源、舰只和军队的了解大开眼界。”他不仅发现了日本的雄厚实力和印度风土人

情的奇迷，还学会了在千变万化的世界里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务，他变得更富有智慧、更老练成熟了。

1922年7月18日，蒙巴顿与富有、聪明、漂亮的埃德温娜·阿丝莉小姐在威斯敏斯特区的圣玛格丽特教堂结婚。尽管他只是皇室家庭的一个外围成员，其婚礼场面依然是华美辉煌的：大批的皇族成员出席了婚礼、1400多客人被邀请前来赴宴、8000多观众从早上5点就开始围观在教堂周围，堂堂的王储威尔士王子亦即后来逊位的温莎公爵居然做了他的男傧相。对普通的市民来说，观看这一次婚礼确实大饱眼福，见到了只有想象中才能见到的场面。报纸则推波助澜地渲染这一盛况：《约克邮报》用了整整13版的版面来报道这场婚礼；《星》报说这是一次世纪的婚礼；《每日电讯报》稍微适中一点，说这是这一年的婚礼。不管怎么说，这个重要时刻是令人难忘的。更使蒙巴顿高兴的是，在婚礼举行的同时，他被封为维多利亚爵士团的爵士。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是先到巴黎、然后去德国蒙巴顿的老家、后来又到了美国。年仅22岁的蒙巴顿对《纽约太阳报》的记者说："我已见到了世界上85%的风景胜地。"与英国国王关系最密切的人和世界上最富有的女继承人组合的这对新婚夫妇成了美国最注目的新闻人物。喜剧大师查尔斯·卓别林设宴款待他们，还和他们一起拍了一都电影。蒙巴顿说卓别林"是一个可爱的小个子，羞涩、哀伤，但充满幽默感。他可以让人们一气笑上一个小时。"两人后来成了终身朋友。长达6个月的蜜月旅行结束后，蒙巴顿回到英国，在"图恩特"号驱逐舰上工作。此时的皇家海军正处于困境，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以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而自豪，但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政府颁布了大量裁减军费的法令，蒙巴顿的52%的同级海校的同

学离开了海军，蒙巴顿却被留了下来。有人愤愤不平地问裁减委员会的委员柴尔菲尔德，为什么像蒙巴顿这样富有的人逃避了“斧头”(指第一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严厉的裁军措施)？柴回答说：“在委员会工作的人所遵循的唯一原则是：以是否对海军有好处来取舍人。我了解蒙巴顿，并且认为他的留下对海军有益。”

1923年，蒙巴顿在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通讯学校工作。他努力钻研，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翻译电码的速度超过有15年资历的专业人员。1925年，他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继续深造，1927—1933年，在地中海海军舰队从事无线电工作。该舰队总司令意识到蒙巴顿非凡的军事才干，在推荐他的信中说：“再也不能把他仅仅限于无线电通讯业务部门了。”1934年，蒙巴顿到“勇士”号驱逐舰上当舰长，该舰是当时英国最新的驱逐舰之一，最高航速可达38节。然而，8个月后，“勇士”号被调往新加坡，新换的“威沙特”号比“勇士”号小而且旧，尽管如此，全舰官兵在蒙巴顿的训练下，每次考核和比赛，成绩都名列前茅。

1936年初，蒙巴顿返回伦敦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葬礼，并趁机向当局人物探听他将来的升迁问题。不久，他即被舰队司令费希尔召见，同时在座的还有后来费希尔的继任者达德利·庞德和英格兰舰队的巴克豪斯上将。这几位大人物召见他的目的，主要是想考问一下他对英国将来战略的看法以及伦敦将来的发展。蒙巴顿的回答使他们很满意，不久，他被调到海军航空兵部工作，1937年6月，他晋升为上校，当时一般被提升为上校的人的年龄都在42—45岁之间,而他只有37岁。

1938年，蒙巴顿的哥哥乔治亚因患癌症去世，他便成为

侄儿菲利普亲王（即未来的爱丁堡公爵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的保护人。

1939年，二战爆发初期，蒙巴顿奉命指挥新型的“凯利”号驱逐舰，任第五驱逐舰队司令和“凯利”号舰长。他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该舰编入现役的准备和补给工作，他对士兵们的首次讲话在全国有口皆碑：“根据我的经验，我一贯认为，如果一条船不能使人幸福，它就不会有高的效率；同样，如果你不能使它作到高效率，你也就不会有一条使人幸福的船。我将以这种方式来开始我的任职；并以这种方式进行下去—一条使人幸福的、高效率的舰只。”几天以后，“凯利”号即和德国潜艇交火，击沉一艘德国潜艇。1940年4月底；“凯利”号开始了一次最值得纪念的航行，蒙巴顿指挥它和“伯明翰”号巡洋舰一起，到荷兰沿海一带去搜寻德国的布雷艇。“凯利”号被鱼雷击中，有27名水手被炸死，许多人受伤，除了紧急信号灯以外，船上任何动力都没有了。其他舰只以为“凯利”号必定沉没，不会有什么幸存者。由罗布森指挥的“坎大哈”号试探地打信号给“凯利”号：“舰长还活着吗？”蒙巴顿得意地回答：“活着。你还不能指挥这支舰队呢！”经过91个小时的奋战。“凯利”号终于被拖回了目的地，这是蒙巴顿一再坚持不炸沉它的结果。“遇到损害后的控制方法”一直是蒙巴顿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凯利”号的返航就是平时训练后收到的良好效果。一位视察了受伤的“凯利”号的军官说，如果船的损坏再严重一些，生存下来简直是不可想像的，把这条船开回港口是一个功绩，它不仅靠勇敢，还要有精湛的航海技术。蒙巴顿的功绩得到了公众的青睐，也得到了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赏识。他指示说，这位年轻骁勇的军官应当获得优质服务勋章。1941年5月，“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利”号奉命参加地中海东部的克里特岛战役，在返航途中，遭到 24 架德国飞机的轰炸，“凯利”号被炸沉，“开普林”号将蒙巴顿从海上救起，他得以幸免于难。他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失去了战舰和一半以上的军官，自然非常悲痛。坎宁安（英国海军总司令）使我感到，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海军这次的表现很出色。”

1941 年初，蒙巴顿受命担任“光辉”号航空母舰舰长，10 月，首相丘吉尔任命他为盟军联合作战部顾问。蒙巴顿很早以来就对联合作战计划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没有“光辉”号的话，他将会很高兴地得到这一机会，并把自己的见解付诸实施。但他已把全部心血交给“光辉”号了，他在日记中写道：“首相给我下达的命令真使我为难。”他一直以为他会得到允许重返“光辉”号，丘吉尔却大发雷霆：“你这个蠢货！你最好是重复上次做过的那件事，把你自己淹死。”此时蒙巴顿已晋升为准将，他接替年已 70 岁的凯斯接任这一新职后，公众的反应是热情的，他们认为这个年轻而富于魅力的英雄能够领导部队从只有招架之功的境况中摆脱出来，能够对德国佬发动攻击。尽管公众的反应是好的，蒙巴顿的年龄和军阶却使他不能和那些比他更有经验、更有威望的人平起平坐，他从一种从属地位来谨慎而有节制地开始自己的新工作。正因为如此，丘吉尔才在时机成熟时扩大了他的权限。12 月初，他受命担任双重使命：作为顾问，他将与参谋长委员会和突袭部队共事；作为“联合行动准将指挥官”，他还负责突袭部队和大规模的长期作战的行政后勤指挥。他接受任命后的第一次突袭行动是袭击挪威南部的瓦格索岛。这是盟军海、陆、空三军第一次成功的协同作战。

丘吉尔对蒙巴顿处理事务的情况非常满意，他感到自己

选择的正确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现在应该进行下一步了。1942 年 3 月 4 日，蒙巴顿奉召前往唐宁街与首相共进午餐："他告诉我我将担任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担任第四参谋长，被授予海军中将、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的军衔。"丘吉尔的这一任命首先就遭到了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的反对，他写信给首相说："海军受到了震动"，因为他们认为海军部的建议受到了漠视。丘吉尔却不为所动，他致函参谋长委员会，要求这一任命得到认可。蒙巴顿对这一任命感到十分高兴，他写信给女儿说："我现在走到哪里都佩戴着海军中将的纹徽，我感到很自信……尽管陆军和空军要我穿上陆军中将和空军中将的制服，我现在却感到不太好意思，自觉资历尚浅。"

蒙巴顿在给妻子或儿女的信中，几乎总是把德国人称作"纳粹"或"希特勒"。英国正在同他父母的祖国交战——在那个国家里，他曾经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且有许多朋友——这一事实使他感到颇为不快。但是，他的忠诚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认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英国人，对英国取得胜利有义务。

1941 年底，美国参加了对德作战，盟国开辟第二战场已成了可能。蒙巴顿现在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总部，在这个总部里，凭着对英国事业的忠诚和超越本国利益的努力，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将同英国人、法国人及其他国家的盟友共同工作。这种大胆而宏伟的观念完全符合蒙巴顿的气质，当美国人第一次视察蒙巴顿这个尚不成熟的总部时，就发现有些东西是值得钦佩和支持的。1942 年春天，他控制住了一部分重要的指挥权力，他的威望也有了很大提高。据说丘吉尔曾考虑过要任命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这说明他已经建立起

了自己作为主持战事的成员的地位。1942 年 3月，盟军在考虑反攻欧洲大陆的登陆时间及地点。蒙巴顿坚持认为，盟军在 1942 年 7月以前不可能集结起一支大规模的登陆部队，如果重返大陆的有限行动（即流产了的“重锤”行动）付诸实施，集结部队以进行大规模反攻的计划就要遭到严重影响。在选择地点方面，空军指挥部指挥官肖尔托·道格拉斯和本土部队总司令伯纳德·佩吉特强烈要求在加来海峡登陆，蒙巴顿则坚持认为，如要取得成功，必须避开德军易防守的加来地区，把进攻地点定在诺曼底附近的塞纳湾一带。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联合作战指挥部的军官们强烈地为在加来登陆争辩。蒙巴顿一反平日谨慎的态度，以参谋长委员会成员而不是联合作战指挥官的身份坐在椅子上，“怒气冲冲地枪毙了他们的计划”。在此后举行的一次由蒙巴顿主持的会议上，把诺曼底作为登陆地点的主张终于得到了各方的最后认可。可以说,盟军 1944年 6月 6 日在诺曼底的成功登陆是由蒙巴顿为它打下基础的。

1942 年 4 月初，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来到伦敦，就如何发展盟军战略问题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交换意见。他的一位颇受赏识的随行人员以为蒙巴顿是位花花公子式的人物，然而蒙巴顿的“巨大热情和想象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歇尔问蒙巴顿，美国能做些什么。蒙巴顿立即回答说：“请通知把英国关于登陆艇和登陆舰的需求增加一倍，请您受理新的订单。”他拿出一张纸，在上面草拟出一份登陆艇计划。马歇尔接过这份庞大的订单，表示将尽力而为，实际上，美国提供的远比计划要多。

一个月以后，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来到伦敦，参加参谋长委员会会议。当他被问及谁能胜任盟军最高司令官一职

时，他回答说：“在美国，我多次听说有一个人几个月来一直在深入研究两栖战问题。我知道他的职务是联合作战最高指挥官，我想他的名字是蒙巴顿……我听说蒙巴顿将军是一位充满活力、智慧和勇敢的人，如果这一行动主要由英国部队去完成，我想他能够担任这一工作。”布鲁克站起来说：“将军，也许您还没有见过蒙巴顿将军。这就是他，坐在桌子对面。”艾森豪威尔很快成为蒙巴顿的亲密盟友，两人互相尊重、互相信任。艾森豪威尔就任盟军最高统帅一职后发生的一件趣事说明了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抽烟很凶，他感到，如果在宴会为国王祝酒之前一直不准抽烟，他将难以参加任何这样的宴会。蒙巴顿坚持要他去参加在联合作战总部举行的一次宴会，并说吸烟不会有任何问题。结果是在这次宴会上，刚刚把汤喝完，蒙巴顿立即起身为英王和美国总统的健康干杯，然后，他高声说：“将军，你现在可以开戒了。”

1942 年 8 月 19 日，蒙巴顿组织了一次被命名为“大赦”行动的突袭，即对法国西北部迪普耶港的试探性袭击，结果遭到惨败，在参战的 5000 人中损失 3336 人，登陆艇指挥官布赖恩·麦库尔被俘。德军在审讯他时问：“麦库尔，这次行动作为一次突袭来说规模太大了，而作为一次进攻来说又太小,它究竟是什么呢?”麦库尔答道:“如果您能告诉我答案，我将非常感谢。”目标的不明确性是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蒙巴顿为此遭到了有生以来最严厉的批评。但是，这次失败的登陆行动却为以后的诺曼底登陆提供了经验。诺曼底登陆成功后，丘吉尔、马歇尔、尼米兹等 5 人写信给蒙巴顿说，诺曼底冒险的成功，是与蒙巴顿和联合作战部人员的精心筹备分不开的。除了从失败中提供登陆经验外，蒙巴顿还曾为实现诺曼底登陆出谋献策，搜罗各种人才，准备登陆装

备等等，功劳确实有他的一份。

1943年8月，蒙巴顿随丘吉尔前往魁北克，与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参谋长联席委员会成员会见，讨论制订抗击德、日法西斯的宏伟战略。8月15日，在与丘吉尔共进午餐后，丘吉尔对他谈起东南亚，问他是否愿意到那里去整顿局面。他以为首相指的是短期的视察，便回答说，他愿意服从调遣，但他希望能够回到海上去“重操旧业”。丘吉尔愤怒地说：“回到海上！难道你不明白我在建议你担任最高统帅吗？”在丘吉尔的极力推荐下，美国也同意蒙巴顿担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统一指挥英印、美国和中国国民党军队。

东南亚的局面确实需要整顿。1942年4月，英国人被赶出了缅甸，英、印军队装备不足，皇家空军软弱无力，情报机构默默无闻，中国国民党军队纪律涣散，缅甸人则态度冷淡，时常充满敌意。走马上任后的蒙巴顿发现，这里的指挥系统错综复杂，部队来自不同国家，士气不振，协同作战十分困难，这是一项十分棘手的任务。蒙巴顿的美国副手是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史迪威是一位优秀的作战指挥官，也是一位有勇有谋、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但他的眼界却较狭隘，管理能力有限，而且有些愤世嫉俗，因而有“尖酸的乔”的绰号。马歇尔从华盛顿要求他与蒙巴顿很好地合作，汉迪将军则劝告他，即使他不唱《上帝保佑国王》（英国国歌），至少在演奏这支曲子时应当起立。但是，史迪威对英国的恐惧和他对中国的轻蔑一样厉害，蒙巴顿对这样一位副手将要带来的麻烦自是心中有数。史迪威和蒙巴顿面对面在一起的时候，尽管表现出若无其事、甚至友善的态度，但私下里却称他“一个愚昧的混蛋”“稚嫩，喜欢出风头”“尿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对蒙巴顿表示出一种敌意，美方的盟

军副参谋长艾伯特·魏德迈就对他提供了热情支持。他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真正国际性的、把最高指挥部的利益放在高于本国和本兵种利益之上的工作班子。他成了盟军合作的象征，他的座车上挂着在他指挥下的各国军队的旗帜，司令部中的各个机构分别由有经验的英国人和美国人负责。另外，他也成功解决了季风、疟疾和士气三个问题，这是保证战胜日军的三个前提条件。到了 1944 年春，他的部队已经作好了和日军作战的准备。

日本人清楚地意识到了盟国在印度的兵力集结以及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建立对它的潜在威胁，便加强了“在印度洋地区的防御屏障”缅甸的兵力部署。 1944 年初，驻缅日军共达 8 个师。这年 2 月，日军先发制人，首先在若开地区向盟军发动了进攻。英国军队遭到了侧翼包抄，但他们没有逃跑或缴械投降，而是坚守阵地继续战斗。在保卫市政当局所在地的战斗中，驻扎在周围的 15 支部队完全依靠空中获得供给，成功阻止了日军的登陆。这一胜利标志着一种新战略的诞生，也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蒙巴顿对他们说：“只要坚守住你们就可以创造历史。”他们坚守住了阵地，也创造了历史。由于得不到物资增援，再加上担心英国军队发动反击，日军被迫撤离，8000 名日军中有 5000 人被打死。

3 月，日本第 15 军司令官牟田口指挥三个师团向印度进军，企图夺取印、缅边界的军事要地英帕尔。蒙巴顿和英国第 14 集团军司令斯利姆将军指挥英印军队顽强抵抗。 7 月，英帕尔战役结束，日军损失近 10 万人。与此同时，在缅甸北部，史迪威指挥下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新编第 38 师和第 22 师，于 1944 年 4 月至 8 月攻克了战略重镇密支那，占领这一地区通往印度的三个重要机场。尽管蒙巴顿对史迪威未把自己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计划向他报告感到恼火，但他并没有像史迪威想象的那样有受辱感和勃然大怒，他只是平淡地对别人说：“占领密支那机场真是一条好消息，对吗？那是我最感兴趣的战线之一，是由我的副手史迪威将军指挥的。”

8月3日，蒙巴顿飞回伦敦，就他拟定的下一步作战计划征询上司的意见。在他离开以后，史迪威以副统帅的身份领导司令部的工作。他感到司令部的气氛令人不快，无休无止的会议令他难以忍受——“可怕”、“愚蠢”、“这种强人所难的做法总是使我不自在！”总之，他对司令部的一切都不满意，许多人说他是“在忧郁的苦海之中”。蒙巴顿后来回忆说：“在我回来以后，我的所有高级参谋人员——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向我报告说，他没有能力就整个战场的形势发出任何有益的指示。”蒙巴顿一直认为史迪威对他是有感情和敬重的，史迪威却认为蒙巴顿讨厌他。两人之间的不和因史迪威对待特种部队的态度而进一步加剧。10月，史迪威被解除了职务，他认为蒙巴顿应对此负责。蒙巴顿对他说：“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难以与你共事……但是，我可以证明，在所有你我个人之间的问题上，我发现你是易于相处和乐于助人的。”他又对罗斯福总统说：“对于史迪威的离去我感到很遗憾，这不仅是因为我从个人角度来说喜欢他，而且还因为这将意味着我将失去我亲爱的艾尔·魏德迈。”

1944年底，蒙巴顿指挥的东南亚盟军已近百万人。盟军拥有战略优势，日军开始节节败退。蒙巴顿抓住战机，及时制定具体作战计划，指挥盟军发动反攻。盟军除从缅甸北部向南推进外，还从西部向中部进攻，蒙巴顿和斯利姆将军指挥部队南下瑞波平原，强攻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同时以

摩托化部队与坦克部队为主力，出其不意奇袭敏铁拉。 1945 年 3 月 21 日，盟军占领曼德勒和 8 个机场，肃清了若开海岸至支达巴岛的敌人，使盟军大型空军补给基地从原来的阿萨姆南移 500 英里。接着，蒙巴顿又指挥盟军分东、西两路进军，西路军在肃清卑谬的日军之后，向伊洛瓦底江下游挺进；东路军则占领仰光附近的勃固。 5 月 3 日,盟军占领缅甸首都仰光。

夺取缅甸之后的下一个重大步骤是进攻马来半岛的两栖行动，这一被命名为“拉链”的行动成为蒙巴顿作为最高统帅期间事业上的顶峰。

1945 年 9 月 12 日，蒙巴顿在新加坡市政厅代表东南亚盟军接受了驻东南亚日军的投降。签字以后，他命令日本人离开。“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厌恶、恶心和野蛮的脸”，他在日记中写道，“当这些日本人离开座位，蹒跚地走出去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群猩猩，穿着布袋一样的马裤，膝关节几乎拖着地面。”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中国代表拿出照像机，把仪式的情景拍摄下来。仪式结束之后，蒙巴顿乘车“穿过密集的人群，在无尽无休的雷鸣般的欢呼声中”返回几公里外的总部。他后来回忆：“世界上恐怕只有少数人曾经接受过 '50 万敌方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无条件投降。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一天。”战后，蒙巴顿继续留在那里，负责遣返东南亚数十万日军，安置盟军战俘，处理了一系列因殖民主义在亚洲崩溃而产生的外交和政治问题。当尼赫鲁获释来到新加坡时，蒙巴顿亲自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1946 年 6 月，蒙巴顿回到英国，受到盛大欢迎，并获得“高级爵士勋章”。第二年，英王又加封他为“缅甸的蒙巴顿伯爵”，以表彰他在缅甸卓著的战功。

早在战争结束之前，丘吉尔就对蒙巴顿谈到战后他的升迁问题。蒙巴顿预感到丘吉尔不久即会下台，因此对他的暗示并不热心。幸运的是，新任首相艾德礼也颇赏识他，并于1947年元旦召见他，任命他为英国驻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指示他在把政权交给印度之前，从印度运回一切殖民掠夺所获得的珍宝。对于充当帝国遗产清理人的角色，蒙巴顿感到有损王室颜面，但是英王乔治六世支持对他的任命。经过与首相的协商，他获得了任何一个印度总督不曾有过的特权，即享有全权和获得行动的完全自由。这年的 3 月 24 日,蒙巴顿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他与印度各政党和教派领导人频频会晤，商谈双方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鉴于印度局势一触即发，他与甘地、尼赫鲁、真纳等人商定，把转让政权的日期从原来商定的 1948 年 6 月提前到 1947 年 8 月 15 日,并制定了关于印度独立的方案，即“蒙巴顿方案”。其主要内容为：英属印度根据居民及其宗教信仰的不同，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分别建立自治政府；巴基斯坦由东、西巴基斯坦组成；五公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以加入印、巴任何一个自治领。5 月 18 日，蒙巴顿带着这一方案飞回伦敦，要求首相立即付诸表决。 7 月 5 日,该方案以印度独立法案的名义正式提交英国议会。 7 月 16 日获得批准，8 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建国。由于“蒙巴顿方案”没有认真地解决民族、教派的问题，两国在分别立国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和仇杀。而且该方案对克什米尔的归属悬而不定，导致两国至今都还为此发生武装冲突。 1948 年 6 月，蒙巴顿被从印度召回国。首相艾德礼亲到机场迎接，并称赞他说：“没有人能完成这样繁重的工作。”

回国后的蒙巴顿被派往海军供职，先后担任马耳他岛巡

洋舰队司令、海务大臣和供应运输署长，地中海舰队总司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等职。1955 年 4 月 18 日，他被任命为海军参谋长兼第一海务大臣， 1956 年，他获得海军元帅军衔，1959 年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参谋长和参谋长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他积极推行改革军队的计划。在他的建议下，英国取消了分别设立的海军部、陆军部和空军部，设立国防委员会行使三部职权，统归国防大臣领导。

1974 年，蒙巴顿访问中国，他是第一个访华的英国王室成员。

1979 年 8 月 27 日，蒙巴顿在离北爱尔兰边境 19 公里的马勒摩海滨消夏时，乘坐的游艇被爱尔兰共和军预先设置的炸弹炸毁，蒙巴顿遇难身亡，时年 79 岁。英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农民出身的军事家
——崔可夫

农民出身——少年军官——出使中国——屡建奇功——苏军中坚——彪炳史册

1900年2月12日，在沙皇俄国图拉省的谢列布里亚内普鲁德村的一个被称作“鳄鱼嚎”的小木屋里，农民伊万·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喜得第四位公子,一个瘦猴似的婴儿。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瘦弱的婴儿竟成为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在二战中立下赫赫战功、二战后又一度主宰东德命运的苏联元帅——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

瓦·伊·崔可夫家境贫寒，年仅12岁就不得不中途辍学，独自到人生地不熟的彼得堡工厂里做工，忍受领班的刁难与淫威，同时也接受一些做人和革命的道理。1917年9月，工厂倒闭。失业后的崔可夫便到3位哥哥服役的波罗的海舰队，在喀琅施塔得当了一名水兵。十月革命胜利后，崔可夫进入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学习。此时的苏维埃政权尚不稳固，国内叛乱不断，国际的武装威胁也从四面八方袭来。崔可夫在学习期间，经常与学员们一起参加平定国内各种暴乱，

在第二次参加实战时，崔可夫就击毙了刺杀列宁的反革命分子，初露锋芒。1918 年冬末，崔可夫受命下到基层担任副连长，带队与白匪军作战。身经百战的士兵对这个“乳臭未干”的学生官露出满脸的不信任，且时不时挖苦讽刺他。崔可夫并不生气，在一次实战中巧妙部署兵力，以少胜多，成功粉碎了白匪军的偷袭。他的出色表现令团司令部和战士们刮目相看，一致推举他接替了重伤的连长。到过前线的崔可夫免试获得了“红军军官”证书后，就任步兵第 40 团的副团长，正式成为苏俄红军的一名中级指挥员，在著名的 28 师师长阿津的直接领导下抗击高尔察克白匪军。

一次，步兵第 40 团接到阿津师长的命令后，准备出发执行任务。一些富农和社会革命党人利用红军的困难处境，煽动由 700 名逃兵组成的第 2 营哗变。他们拒绝执行崔可夫的命令，要求发放新服装和其他许多东西。年轻气盛的崔可夫气得跳上战马就往 2 营冲，企图强迫 2 营服从命令。哗变的战士不但不吃这一套，反而一个个怒目而视，把崔可夫挤在中间，用步枪、卡宾枪逼着他。处于包围中的崔可夫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决定先用缓兵之计，分化瓦解哗变者。他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地说：“好吧！既然这样，那么你们是先开枪打死我呢，还是先吃饭填饱肚子？”随后又转过身对传令兵大喊：“把饭菜送到空场上去！快点！”传令兵心领神会，拔腿往团部奔去。哗变者经崔可夫提醒，想到已有大半天没吃饭了，真有点饥肠辘辘的。崔可夫抓住哗变者瞬间的心理松弛，不失时机地对他们说：“走，到空场吃饭去，边吃边谈……”哗变者不由自主地跟着崔可夫到了空场，而传令兵所带来的共产主义营也匆匆赶到，将哗变者包围起来。一个个哗变者看着黑洞洞的枪口，再看看手中的饭勺、刀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